

中法建交内情:

戴高乐派密使持亲笔信来华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意义深远。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法国追随美国出兵朝鲜。法国不承认新中国,而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继续保持“外交关系”。

1958年,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提出“欧洲人的欧洲”之主张,并将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与美、英形成对抗,以便摆脱美国的控制。中国当时也受到美国的孤立、打压,所以坚决对抗美国。同时,中苏论战加剧,双方关系出现裂痕。中国的独立自主倾向与戴高乐的主张很合拍,中法之间的共同话题增多。

1963年8月中旬,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见其政治盟友埃德加·富尔(法国原总理),决定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

密使

8月20日,富尔到伯尔尼,秘密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富尔将访华意愿告诉李大使,并说此次访问将携带戴高乐授权其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的亲笔信。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富尔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同戴高乐将军关系密切,对中国一向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0月21日,富尔夫妇由香港经罗湖入境,乘火车从深圳到广州,我方特意为客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富尔夫妇。

▷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后合影。



人加挂了专列车厢,广州市市长设宴招待。

22日到达北京,富尔夫妇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富尔感觉到,中方理解了戴高乐的用意。

谈判

富尔首先向中方展示了戴高乐将军写给他的亲笔信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民族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会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戴高乐

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而其内容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由于此次秘密谈判,是由法方主动提出进行的,为避免万一谈不出结果造成法方被动,精明的戴高乐在具体做法上特别小心、谨慎。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了6次并不轻

松的会谈。双方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但谈到建交时,在台湾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双方都表示不能冲破本方底线。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一向坚持的原则是,凡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富尔虽然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却希望中方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希望中方不要强加给戴高乐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

变通

谈判陷入僵局,但是双方显然都表现出相当的诚意。为缓和谈判气氛,让双方考虑寻求解决难题的办法,精明的周恩来安排富尔夫妇去内蒙古、山西等地参观访问。

1963年10月31日,周恩来提出建交变通方案:一、法国政府向中方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来照,并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方案报送中央,毛

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

新方案的要点是:不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是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模式。

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取得了突破。

预言

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了又在印度“优游”多日后回到法国的富尔,表示同意他的访华报告,准备法中两国相互承认。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也许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在访问非、欧、亚14国。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4天后,一向喜欢利用记者招待会突如其来宣布重大决策的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了1000多人出席的记者招待会,颂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马保奉

历史短波

毛泽东:别硬搬中国经验

1956年9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等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11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用武装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那时起,毛泽东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经久不衰。

张云逸:密见叶挺劝出山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于国共两党意见分歧,军长人选一直悬而未决。张云逸为此力荐叶挺出面领导抗日,这一人选得到了双方的支持。张云逸与叶挺曾是同学,同为张发奎部属,亦同为北伐战友。为此,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化装为华侨阔佬,西装革履,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将军,力劝其出山任新四军军长,领导抗日工作。叶挺将军回忆,张云逸先生的到来,让他感到如“久旱逢甘霖,寒冬见新绿”。

金克木:按大师书单读书

1930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到北大图书馆,借校勘古籍用的参考书。他一进图书馆,便把书单给了一位年轻的管理员。管理员见书单上列的都是些珍贵的古书,末尾还备注着“为校注书籍所需,请馆长准予借取”,他不敢怠慢,赶紧去请示馆长。馆长担心这些古书外借会遗失,便让管理员找借口回绝了刘文典的请求。无奈,刘文典只好悻悻地离开。这时,管理员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抓起一张废纸,凭记忆把刚才的书单写了下来。之后他一有时间,就找来书单上的书学习,结果受益匪浅。这位年轻管理员就是金克木,只有小学学历的他,靠着自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 张小平

百年不衰的军大衣

近日,“羽绒服涨价把市场让给了军大衣”这一话题冲上热搜。

军大衣的起源,跟英国有关系。工业革命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贵族也开始考虑简化穿着以提高生活效率。此时出现的“夫拉克外套”开始对原本过于复杂的设计进行简化,形成了双排扣、枪驳领、过膝摆的款式。跟早期贵族那种复杂的穿着比起来这种款式显然简化很多,更方便出行及工作,很快在欧

洲流行起来。

这种风潮很快影响到军队。1901年英国设计师巴宝莉把原来的夫拉克外套改进,去除了无用的功能,加强了保暖能力,这种被称为巴宝莉式的新型军大衣就成为英国军官的军服大衣制式款。由于这种军大衣既时尚又保暖,很快传遍整个欧洲军界。

当然在传播过程中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后来在高寒地区,有人又给这种大衣加上了毛脖护

领,形成了今天军大衣的基本款式。

至于这种款式的军大衣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一般认为是袁世凯在建立晚清新军时期最早引入的。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引入的不止有西方训练方式,还有西方的军服款式。而现在大家最熟悉的那种军大衣则是苏式款式,在抗美援朝后才广泛流行。抗美援朝期间,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穿的多是棉衣棉裤,因为军大衣比

较笨重,棉衣棉裤则相对来说更方便活动,这对于靠机动灵活作战的志愿军指战员帮助更大,而苏式军大衣则更多地配发给干部或文工团人员。

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原回家,也把军大衣带回到了家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冬天穿着军大衣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1965年随着军衔制的取消,这一身军大衣成为军便服,顿时变身为全国人民喜欢穿的“国民服装”。郭歆